



蔡元培与胡适的“异曲同工”

安徽合肥 刘学升

我是一个喜欢联想的人。近日到北大红楼参观,遥想当年北大校长蔡元培与教授胡适(后任北大校长)这两只著名的“兔子”(他俩都属兔,被人称为“兔子党”)在北大所做的贡献,心中油然而生出敬慕之情。我在学习历史人物的过程中,觉得蔡元培与胡适有一些“异曲同工”之处,值得回味。

尊重女性

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,主张“思想自由,兼并包容”。在男女问题上,他亦主张男女平等,且以身作则,言行如一。蔡元培平时给夫人写信,信封上从来都是写明夫人的姓字,或在夫人姓字前面加一个“蔡”字,绝对不直接写“蔡夫人”,可见他对女性的充分尊重。

而胡适“怕老婆”是众人皆知的。胡适主张男人要“三从四得(德)”,即太太出门要跟从、太太命令要服从、太太说错要盲从,太太化妆要等得、太太生日要记得、太太打骂要忍得、太太花钱要舍得。胡适的这个主张虽然很幽默,但细细品味,就能知道他尊重女性的程度非同一般。

成人之美

抗战初期,蔡元培因病滞留香港。有一天,他收到一封从重庆寄来的信件,原来是一位素不相识且自称是北大学子的青年寄来的。这个青年在信中说他在重庆无以为生,想请蔡先生帮助。蔡元培当即写信向某单位负责人举荐。不久,用人单位负责人写信给蔡元培,说那位青年报到时,所出示的毕业证并非北大所发。蔡元培回复说:你不必在意他是不是北大毕业生,只要他是人才就可录用,如果他不是人才,即使徒有北大毕业证也断不可用。那位青年得到工作后,来信向蔡先生致歉并感谢。蔡元培没有责备他,反而勉励他努力工作,服务社会。

胡适提携后进同样不遗余力。他推荐北

大学生千家驹到陶孟和所主持的社会调查所工作。陶孟和打听到千家驹是北大学生会的一个“头头”,是北大著名的“捣乱分子”,而且还“可能是共产党”,便有所顾虑。胡适得知后,对陶孟和说:“捣乱与做好工作是两码事,会捣乱的人不一定做不好研究工作,况且一个研究机关,你怕他捣什么乱呢?”于是千家驹得以到社会调查所工作。

身后无财

蔡元培晚年旅居香港,手头拮据,生病也无钱医治,1940年3月3日在住所摔倒住院,5日在医院病逝。北大教授王世杰(后任北大校长)在《追忆蔡元培》一文中说,“蔡先生为公众服务数十年,死后无一间屋,无一寸土,医院药费一千余元,蔡夫人至今尚无法给付,只得在那里打算典衣质物以处丧事。衣衾棺木的费用,还是王云五先生(王云五当时是商务印书馆总经理——笔者注)代筹的”。

1962年2月24日,胡适在台湾“中央研究院”蔡元培馆向来宾致祝酒辞,讲话过程中因心脏病猝发倒地,经抢救无效去世。胡适去世后,家人在清理他的遗物时,发现好衬衫只有一件,好袜子只有一双,其他的衬衫和袜子都打过补丁,虽令人不可思议,但能够让人理解。

“君子成人之美,不成人之恶”。我认为这句话用在蔡元培和胡适的身上是最合适不过的了——他们尊重女性,是一种难得的修养;他们成全别人,是一种难得的美德;他们死后无财,更是一种难得的境界。

岁月匆匆催人老

安徽合肥 干嘉强

三十而立,四十不惑,五十知天命……这些年龄数上的界定,成了人们行为意识上的潜规则。于是大家都习惯把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作个回头定论,我亦如此。到了天命之年,蓦然回首:真的是岁月匆匆催人老啊。

年轻时只顾努力工作,像一只快速旋转的陀螺,有始无终地转呀转,从没有想着要停下来歇一歇,感觉有做不完的事在等着自己。俗话说低头拉车、抬头看路,那时只顾低头拉车,没有注意看路,结果等到我白了头,突然想要回头看时,惊呆了,一下子把五十年的路都走完了。

人生只有一个五十年,两个五十年就一百岁,尽管现在物质生活和医疗条件都比以前好,但真正能活到一百岁的人毕竟太少,生命是有始有终的,这是人生中的自然法则,谁都违背不了,谁也抗不过去。

驿路之上,五十年的辗转劳顿,有时让我疲惫不堪,可好在总有一些感动和爱伴我同行,在困难的时候伸出手拉一把,在孤独的时候陪我说一段温馨的话。

我要感谢命运,虽然一路磨难重重,但都有惊无险地走过来,没有在劫难逃的悲观失望。我同时还收获到淬火重生的快感,品尝到苦尽甘来的滋味,我从未把磨难当成劫难。

我要感谢人生,总是在不同的阶段给我出一张考卷,让我围绕主题反复思考、慎重解答,没有思而不行的原地踏步。我总是在提醒自己不能信手涂鸦,要交出一份合格的人生答卷,我从未把思索当成彷徨。

我要感谢工作,让我学会担当,学会负重前行,没有无所事事地游走在生活的边缘。找准自己的角色和位置,在实践中锤炼自己,我从未把担当看成负担。

我更要感谢家人,是他们做了我坚强的后盾,让我汲取人间的烟火味,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幸福,战胜所遇之艰难。

愉快的、惊喜的、悲伤的……我把它们放在人生的行囊里,让愚钝的思维翻看泛黄的书页,让静谧的时光缓缓流淌在指间,与岁月一起坐看云卷云舒,让内心积淀沉静与温暖。

一片叶,落在哪里都是归宿;一个人,走到哪里都是生命。保持一颗平常心,不念过往,不畏将来,因为“只盼少许,才能接近更高的幸福”。

用讲故事建立一种历史 于人间烟火处抒写热望

——读《时代三部曲:春和景明》



蔡宇

擅长讲述“皖南往事”的安徽作家陈家桥,其“时代三部曲”终结篇《春和景明》于近日出版。“时代三部曲”包括《红星闪闪》《山河人间》《春和景明》,加起来近百万字,创作历时十三年多,故事背景横跨革命、建设和改革开放三个大时代环境,皆以普通人为叙事主角,书写中国社会近百年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,呈现几代中国人的群像。

陈家桥作为小说叙事艺术的“探索者”,在继《红星闪闪》的口述史形式、《山河人间》的书信体之后,于《春和景明》中再次试验新的写作方式“说书人讲故事+双线叙事”。《春和景明》分为“从六城来”“到六城去”两大篇章,上篇讲述处在人生岔路口的普通女性——裕芬,在家庭关系破裂时遭遇变故,心灰意冷的她展开了一场在外人看来匪夷所思的“拯救行动”,却因此走入不同人群的日常生活,逐渐找回自我;下篇则叙述了裕芬的前夫“我”与法国姑娘苏菲相遇,对东方文化十分憧憬的苏菲和经历了中西方文化思想碰撞的“我”所面临的由文化差异带来的情感考验。小说通过国人看世界与外国人前来了解中国的角度,呈现了在改革开放时代背景下,我国人民的生活及精神面貌所发生的巨大变化,以及随之产生的强烈的时代责任感。

“书写伟大时代,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”,是陈家桥一以贯之的写作指导。《春和景明》中,作者一如既往地以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情愫贯穿寻常生活,把普通人的独特情感经历放在一个大的历史背景下书写,以小见大,讲述隐没于日常的现代传奇故事,展现人们在时代变迁中的自我探索和成长。